

这事儿发生在四月中下旬我从台湾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还在台湾奔波演出时就接到在网上结识的一个文化公司的年轻经纪人小闻的微信,问我什么时候回京,他要请我去讲一节课。

我这人喜欢讲话。之所以还称不上“话痨”,是因为我还算懂事,客观观众允许活泛的时候我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要控制好不能让人唾沫星子喷到人家脸上。但如周围环境明显肃然而不欢迎长舌者讨嫌的,我便会变成十分安分娴静的人。舞台上长大的嘛,表现能力较为丰富。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奔向北大下关街道办事处。4月23日是“世界读

我这不是在写童话,因为那位土豆太太就是我。我这个诨号出处是我的豌豆先生,而豌豆先生的诨号来自于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对气温的变化特别敏感,不仅是室外,就是室内的空调温度,只要相差1度,不用看温度计,他说得挺准。除了对温度的敏感,他还对咸淡敏感,对轻重敏感,对厚薄敏感,总之,他是一个感官特别敏感的人。这让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豌豆公主,于是,我就送他一个名副其实的诨号豌豆先生。当然啰,我也不能厚此薄彼,我给自己也起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诨号——土豆太太。这不光是我从小就爱吃土豆,生活中的我实在是个粗线条的人。

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中,我们的反差实在太太啦,但是豌豆先生与土豆太太却相处得十分融洽,那秘诀何在?我想是我们的本性所使,是我们都善于为对方着想吧!

豌豆先生的感官虽然敏感,可是在家中他是能担当起一切的男子汉;购物归来,豌豆先生双手提着东西,而土豆太太则双手空闲,晃悠悠地走在他身旁,实在是不好意思。在土豆太太强烈要求下,豌豆先生凭着对轻重的敏感,掂量之后,才把那包轻的东西,递给土豆太太。豌豆先生凭着对气温的敏感,天气稍一转凉,他总会在土豆太太坐的木椅子上放上一个坐垫。做菜时,凭着对味觉的敏感,总是说:“年纪大了,还是吃得淡一点比较好。”土豆太太若稍有咳嗽,他会提醒土豆太太少开冰箱,说冰箱里的冷气会刺激气管。

豌豆先生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自称万能修理师,大到电脑、软件编写,家用电器,疏通管道,木匠泥水匠,样样皆能。他创意新颖,极善废物利用,他用泡沫等材料制作的泡脚机,让孙子每天都要等待在爷爷泡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至于我,看上去大大咧咧是个粗线条的人,但内心却像土豆泥那样的细腻柔软,时刻关心和悉心照料着豌豆先生的饮食起居,为他理发、洗衣、做饭,让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五星级服务。土豆太太制作的纸艺、布艺作品,也常让人赞不绝口。

谁知这么敏感的豌豆先生也有非常不敏感的时候,有天早上,我在叠被时,发现他的枕巾不见了,我们把整个床上的被褥都翻了一遍,也不见那条枕巾的影子。奇怪,它难道飞走了不成?答案就在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揭开了,他脱毛衣时从后背掉下一团很毛的东西,定睛一看,竟是那条找了一天不见踪影的枕巾。“你这么敏感的人,这么大一块枕巾塞在背上,竟然没有一点感觉?”他不好意思地说:“真的没有感觉。”

看来,敏感度也是相对的。这种事在我来说,就经常发生;把袜子卷进裤腿里,手套卷进衣袖里,不足为奇,因为我是土豆太太啊!可是,这事发生在豌豆先生的身上,太令人费解了!

这就是土豆太太和她的豌豆先生的故事。哦,忘了告诉你们,土豆太太今年76岁,豌豆先生80岁,可不是小年轻啰,老头老太也一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

胡同里的百家讲坛

吴霜

书日”。我去讲演的题目与读书有关。文化公司和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共同策划了这样一个主题,还起了一个更加有意义的项目名称,叫做“胡同里的百家讲坛”,将会不定期地为街道作居民请来专家学者讲课。而这第一节,请的是我。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策划者在这一个蛮独特的日子里请我去演讲,一多半与我的著名父亲母亲有关,父母的大名多年来都是各种场合的票房保证,加之他们的女儿又是一个相对有趣的歌唱家和“话王”,讲起父母的故事会妙趣横生。

那天,我穿着上比较严肃,我不是去登台演唱幽默花腔的,我是去为人师表演讲的。着一条黑长裤,黑色小线坎外面套一件红色镶了黑边的敞口薄毛外套,再登上一双舒适雅致的细跟船型鞋,很有点教授讲师的意思,自我感觉挺高雅。

到了讲堂里,看到下面坐了密密麻麻一百多位听众,我感到与平日里的讲堂有些不同,心里有一点打鼓。因为台下的听者并非以往我讲课时见到的那些诸如知识型中年男女、青年学生。那天可完全不同,我听着台下嗡嗡啾啾的一片人声,细细看去,满眼里都是常在菜市场超市里见到的灰白头发的老大爷大妈!他们随意坐在椅子上,有的挎着一看就是要去采购食品蔬菜的购物袋,有的胳膊上戴着袖套,拿卫生纸擦着手,有的挑靠门边的座位坐下,一脚跨在椅子的横档上,做出了一副“听听就走”的态势。看到我们进屋来,大爷大妈们并不停止他们之间的招呼与交谈,讲堂里继续着一片嗡嗡声。我向肚子里吸了一口气,妈呀,今天这课不好讲啊。

办事处和文化公司的领导都讲完话,讲堂就交给我了。我定定神,开始和他们聊了起来。我那天的题目是“父母留下的遗产到底是什么”,这个题目是我专门为这个场合设计的。街道的百姓嘛,社会中最小也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俗话说是最接地气的场合。我讲讲家家都会遇到的遗产问题,应该足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果然,大爷大妈们对我聊的内容显得很有兴致,他们听我说着一些关于家庭遗产的故事,精神很集中,课堂里安静了下来,时不时还为我发出的语言发出一些反响,诸如“嗯”、“啊”,还会有会心的笑。左右,当讲到四五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发现台下的听众们开始表现出了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细微的嗡嗡声有回潮的意思,有人伸胳膊扭脖子,有人开始相互讲话,还有人甚至直接站起来走出去了。我忽然体会到,大爷大妈们其实很像未成年的孩童,他们的注意力大概也就是在三四十分钟左右,时间超出,你说的道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厨房

故乡对我来说是一间正在煮汤的温暖的、水汽湿润的厨房,木头桌上放着切到一半的菜,青菜。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童年最安心与家常的记忆所在。与之相关的是我妈妈,她穿蓝色大褂衣服,梳发髻,身上有厨房煮食物的气味。她是我从小带大的人。

去平时时,我找到她小时候做伴并照顾家人的房子。在那里看到她学会做饭并照顾家人的厨房,它没什么变化。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妈妈带大的,所以我们都在她的睡前故事里熟悉了这间厨房。在平乐的厨房里我好像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吃素,信佛,照顾家里的大小大小,做瘦肉汤给他们滋补,自己不尝一口。

从厨房出来,沿街走上几分钟,就是一间叫泰和的杂货铺,一百三十年历史了。当年我的爷爷是那家店的常客。那里有卖老玻璃油灯。我爸爸曾在油灯下读书,我姑姑曾在油灯下纳鞋底。我们买了两盏,一盏太阳带回去,她要放在旧金山家里的厨房窗前。一盏我带回家,要放在自己家厨房里。它的意义似乎抽象成了一种天长地久的珍贵祝福,来自我们血缘里的根。

理他们就听不下去了。

哇!忽然觉得组织者其实很聪明,他们在计划这个接地气的百家讲坛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没有请来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是我这样一个半学者半演员的跨界演讲者实在是聪明的。您想啊,平日里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一旦台下观众有走神现象,我会在台上随时改变策略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随机应变是常见的状况。

我灵机一动,开始向他们提问起来。我问他们对于我母亲当年演唱的剧

目有什么深刻印象,不少人开始响应我,争着回答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耳熟能详的剧目。他们说喜欢“刘巧儿”中我母亲的形象,“花为媒”唱词的水平高,还有人说他看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母亲演唱的最后一场“软文追”的表演……好了,这样你一声我一语的场面虽说有一点儿喧乱,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回来了。我一看时机已到,抓紧总结,主题回归。就这样,两小时课堂时间瞬间飞逝。最后,在他们兴致盎然的要

解放初期,上海作家协会曾组织我们到苏州洞庭东山参观访问茶园和种植场。大家知道,苏州洞庭东山的“碧螺春”与西湖龙井同属名茶,据说当年曾在新茶出来时送两斤给毛主席,但毛主席通过秘书通知不要送了,说这样的好茶不可多喝。至于水果,种植园品种繁多,也是很有名的。

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两位负责干部,都是抗战时游击队的队员。尤其是其中一位女同志,她给我们讲了她惊险的经历,令大家感动。她曾遭日本鬼子集体枪毙。可是半夜里她醒了过来,原来没有击中要害,她还活着。她好不容易从许多尸体中爬了出来,逃到附近村子。村中老百姓马上给她疗伤和化妆打扮,稍稍恢复后帮助她潜到上海。痊愈后,她重返战场抗战。

有这种经历的我还遇上过一位,他是我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时的同事。他原是解放军,上海解放时到上海,因文字改革工作关系,我们认识了。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他的样子奇怪,一边下巴曾断裂,皮肤长好了,但一看就知道那地方曾经受过刀伤。于是他告诉我,抗战时他曾被日本鬼子集体砍杀,一刀砍一个头,随即把人一脚踢到河里。他就这样下巴被砍,但头未砍下来,随即被踢入河中,头未下水,人没有死。日本鬼子走后,人们来收尸时把他救活了。他也是这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解放后他复员到广州创办新华书店。

我就遇到过这样两位曾遭屠杀而大难不死,充满仇恨怒火奋勇抗战,直至抗战胜利的战士。

求下,我给他们唱了一段评剧《杨三姐告状》。大爷大妈们十分满意,而这时,我只觉得口也干舌更燥,头上还有汗。

说真的,胡同里的百家讲坛可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想告诉各位专家们,也许这里才是你们演讲的试金石。提高国民素质,你们有责任,抓住大爷大妈的眼神,才是你们的本事。



夜光杯

童年的光照

倪既新

地上的小伙伴们惊跳起来。而后,当我们再用小盒子做车厢,拖挂成整列火车时,“开”到哪里,那里就响起“跟屁虫”就比车厢还要多。

我们“造纸”:将叔叔们写过毛笔字的大楷本撕碎浸泡,捣成浆状,漂去墨汁,稀释在大盆清水中,然后用过滤中药药渣的小筛子捞出一薄层贴到窗玻璃上,千后揭下来,就是一张圆形的报纸。我们“装自来水”:把大人皮鞋上的空心鞋带穿套在天竺筷上,外面涂一层融化的蜡油,待蜡凝固,抽出筷子,就有了挺直的输水管。象形的汽车、轮船、飞机、坦克,陆续在我们手中诞生……

创造的同时我们难免破坏:笤帚断把、算盘散架、瓶罐破碎、手破流血……引得保姆常向祖父告状,所幸祖父从不阻止和责骂我们。于是,我们家廊檐下的长石凳前,逐渐

成为孩子汇聚的中心。每当我们有新玩意展示,场面就像如今的新闻发布会一般。

就这样,在游戏玩耍里,科学的理念方法,不知不觉地融进日渐成长的心智之中,我们由此增长了勇气和信念。正因为童年受这样的科学光照和启蒙,我的两个弟弟,虽被“文革”耽误了最重要的初高中教育,但如今,一个已成为拥有百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去年就以“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方案”获得上海市政府的表彰嘉奖;一个成了美国普渡大学的工科终身教授,空气质量专家。

成年后我知道,是“中国科学社”的先驱们创办的《科学画报》,之前还有《科学》杂志。这两本刊物出版至今,而“科学社”成立也满100年了。这100年来,不知有多少像我们一样,在童年青少年时期受到科学光照滋养的人呢!所以我觉得,对这些科学传播先驱的感恩与纪念,鲜活的记忆或许比抽象的论评更温暖人心。

深发展,战斗进展顺利。28日下午攻坚战结束,永城宣告解放。历时4天激战共歼日伪200余人,俘敌县长丁石平等敌千余人,缴获火炮、机枪、长短枪等千余支。庆功会上张震参谋长表扬了32团战斗准备工作做得好,专程赶来庆祝的张震师长还与第一个登城的32团战士照相留念。

后来,父亲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在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我格外想念我的父亲。父亲为国牺牲时我才9个月大,虽然父亲的音容笑貌我无记忆,但他为中华民族抵御日寇侵略而英勇献身的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十日谈

不朽的丰碑

明起请看一组《成长路上》,讲述世界各国儿童的成长故事。责编:王瑜明。

父亲永在心间

张国赢

小朱庄战斗是四师西进的开门红,之后,四师乘胜在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接连与日伪打了十余个胜仗,建立了3县15区的政权和千余人的地方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我根据地内的日伪拒不向我投降,为打压敌嚣张气焰,四师决定攻打永城县

城,歼灭拒降之敌。第一次攻打失利后,四师决定由父亲的32团担任主攻,进行第二次攻打,部署32团从城西关突破,31团和33团分别从东关、南关突破。力争全歼守敌。战前,父亲带人对城西关的地形和敌情进行多次勘察研究,向各营布置了参战任务。为确保攻击顺利和减少伤亡,团调三门平射火炮在攻击开始时负责摧毁和压制西关城楼的三个重火力点,父亲下到连队和战士们研究利用地形蛙式跃进接敌,云梯捆绑炸药爆炸法等具体战术。由于准备充分,指挥正确,8月27日总攻开始时三营长已带七连打掉了城关外的三个火力点,团直射火炮也有效压制了敌城楼的重火力点,担任突击的二营迅速出击攻占了西关,尔后向纵

父亲张永远抗战时期先后任新四军四师34团、32团主力团团长,率部浴血征战在淮北抗日伪顽军。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四师将以主力5个团西进收复并建立豫皖苏边区,为抗日战略反攻做好准备。

8月,西进部队越过津浦线,遭到顽军在南梧桐和白顶山区山口小朱庄所谓“东方防线”的阻挡,敌军在此构筑碉堡、碉堡和圩壕等,易守难攻。顽军苏北挺进第40纵队司令王传绶夸下海口说,新四军就是插上翅膀也别想飞过去。父亲率32团,在师部统一部署下,打响了小朱庄战斗,师山炮营以精准火力摧毁了小朱庄的碉堡和重要火力点,父亲下达攻击命令,指战员奋勇杀向敌